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5.04.002

中国管理研究选题的误区及科学性判断标准

金占明 王克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中国管理研究选题存在着“假大空”和“无病呻吟”的误区。针对选题误区,提出探索性-开发性、实践性-理论性、东方-西方3个评价维度和两个菱形判断矩阵,以期在判断现有研究选题的基础上,为中国管理研究科学选题提供框架性和结构性的向导。中国管理研究应该避免陷入“假大空”和“无病呻吟”的陷阱,少一些由理论到理论、由现象到现象、理论脱离实践的研究,多一些直面管理实践的、探索性的“顶天立地”的研究——顶理论“普适性”的天、立中国“实践情境”的地。

关键词: 管理研究选题; 误区; 探索性; 开发性; 情境化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2015)04-0477-07

Mistakes and Science Judgment Standards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Topic Selection

JIN Zhanming WANG Kewe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Grandiosity and fuss are the main mistakes of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topic selec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ree judgment dimensions, which ar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and east and west are introduced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topic selection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topic selection should avoid both the mistakes of grandiosity and fuss. Studies which are from theory to theory or from phenomenon to phenomenon should be abandoned, and exploratory studies or studies which are targeted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should be encouraged. The ideal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should be more exploratory, and achieve balances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Key words: management studies' topic selection; mistakes; grandiosity; fuss; judgment standards

1 中国管理研究选题误区

中国管理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管理学者管理研究选题的差异。

郭重庆^[1]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历史性突破和面临的挑战出发,提出了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责任,即“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由此,中国管理研究必须是“顶天立地”的^[2]。李平^[3]则认为,中国管理研究应该专注于发展“中国的管理理论”,而非“中国管理的理论”,进而争取世界管理研究的“话语权”。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状况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中国管理研究的选题大多与对学者考核的政策相关,因此,中国管理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徐淑英将中国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点:①开发性研究多于探索性研究;②欠缺研究的情境化;③理论发展没有实质性进展;④独特的中国管理实践尚不明晰;⑤使用西方管理理论去解释或假设中国管理现象的研究过多;⑥对中国企业组织和管理有创造性研究的理论发展滞后;⑦过度跟进和关注西方研究热点;⑧过于重视发表论文而非追求管理真理;⑨过于关注论文数量而非质量^[4]。诚然,上述问题的产生与考核政策导向和学术行政化等因

收稿日期: 2014-04-2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172003)

素密切相关,也是净化学术环境的制度性障碍和难点所在。

毫无疑问,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是衡量研究人员和学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区别他们与其他群体的明显标志,但在如今学术行政化的背景之下,真正有水平的学者和论文却未必一定会受到重视和欣赏,原因如下:①有很多学术机构或大学的领导并非高水平的学者,但却手握学者晋升、工作调动和任用的大权,有时候并不是根据学术标准而是其他的指标,甚至个人的好恶来做出有关决定,从客观上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面而不是努力提高学术水平;②由于上级部门或机构对学术机构或大学领导的考核往往也是类似于单纯追逐GDP指标一样的考核方式(如部门或单位中有多少教授或院士,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多少论文等),因此,驱使大家更多地追逐数量而不能潜心研究自己感兴趣和有深度的研究主题,使很多有才华的学者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流于平庸;③在市场化的压力下,有些期刊收取不合理费用,甚至成为“拉关系”和“走后门”的交易场所,这样一来,使论文数量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位学者的实际学术水平^[5]。总而言之,学术行政化的倾向对国内的学术生态造成了很大破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要做出多方面的努力,甚至需要经历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这有赖于学术机构和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管理体制的变革。

如何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和开展管理体制的变革并非本研究的主题。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论文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平衡中,放弃质量而仅追求数量必将使一个学者距离国际学术前沿与社会使命越来越远,纵然暂时获得了某种短期利益和回报,也必定会有损自身的长期利益,而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由此,笔者认为,尽管学术行政化难免对学者们会有一定的误导,但真正做出选择的还是学者自身。换言之,无论学术生态究竟怎样,真正的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情操和道德坚守,这也许就是人们讴歌“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的缘由。

对管理学真理和论文质量的追求,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的选题。基于前述问题和分析,笔者进一步专注于管理研究选题,总结出以下5种选题的常见误区:①发现西方研究热点,迅速大量跟进。如果毫无辨识地跟进西方研究热点,而脱离本土现实,虽然可能会在顶级的国外

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却使中国的学术研究沦为西方的OEM工厂,生产大量对国内无用的学术文章。②中国情境验证西方成熟理论。有部分学者热衷于运用或组合西方期刊论文中的量表,通过中国情境的数据验证西方的成熟理论,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提升学者的实证研究技巧和逻辑性,但毕竟只是在“做练习”^[6]。此外,就中国某些问题所提假设的显著性也并不意味着其对中国管理研究的贡献也是显著的,练手尚可,但一旦成为主流,中国管理研究就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③阅读大量文献,仅关注理论,增加一些并不十分必要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使其更为“系统深入”地对无关痛痒的理论细枝末节进行所谓的“完善”^[6]。这部分选题的结果是,已有模型变量越来越多,变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使原本可能一目了然的关系被掩盖在纷杂的箭头中。④关注管理实践,从现象到现象浅入浅出地论述问题,缺乏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入分析。⑤热衷于对研究悖论进行更多解释。例如,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言,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是否有影响,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已有大量研究在具体情境中进行了验证,但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其实,两者关系具有高情境化的特点,不同的情境下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只是毫无建树地进行重复检验,这样的结果无非是支持其中一边,在海量文献中再加入微不足道的一篇,研究的价值值得商榷。

归根结底,这些选题方式导致当下中国管理研究中存在“假大空”与“无病呻吟”的误区。

2 管理研究的“假大空”与“无病呻吟”

2.1 “假大空”与“无病呻吟”的概念

我国的管理研究已走过30多年,各种理论分支也越来越多,企业管理实践面对的现实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受西方影响,管理研究的规范性逐渐增强,实证研究俨然成为中国管理学界的主流,进而使得研究选题呈现出越来越细致的趋势;与此同时,对西方理论的引入和对对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关注,涌现出一系列探索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作为中国管理研究的两端(精细化-宽泛化),在特定条件下是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但一旦失去这些条件,走向极端,便会出现管理研究的“假大空”和“无病呻吟”的问题。

为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笔者首先对两者进行简要界定:①“假大空”式管理研究,指对于

一个宽泛的研究题目进行浅入浅出的分析,表现为由现象到现象,或由理论到理论,缺少透彻分析和科学论证。该类研究所选题目可能来源于“长官意志”、学者对问题的不当把握等。②“无病呻吟”式管理研究,指对管理理论和现象的某一细小分支或者方面,甚至是共识和常识的问题进行没必要的、过于细化的研究。该类研究的选题大多是钻牛角尖式的、没有主干的细枝末节,如花费大量笔墨对理论或实践中的共识或常识问题进行过于详尽的解剖。

2.2 “假大空”与“无病呻吟”的现实案例

现有中国管理研究不乏“假大空”式和“无病呻吟”式研究的产物,即便是研究成果发表在公认的管理学顶级期刊上,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一问题。尤树洋等^[7]对中国管理与组织研究近30年的论文进行了分析,发现研究选题存在两方面的明显变化:①关注企业体制改革的论文比重降低;②关系/社会网络、制度环境特征、企业集群等主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现今如果再泛泛讨论企业体制改革,那么便很容易落入“假大空”的陷阱。需要说明的是,宽泛的研究选题并不一定都是“假大空”式的。从东方管理的研究来看,苏勇等^[8]对1994~2008年中国核心期刊发表的104篇关于东方管理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1994~2003年10年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占样本的47%,而2004~2008年这5年间发表的论文则占到了53%,可见学术界对东方管理的重视逐渐增加。在上述论文中,量化实证类的只占6.7%,大部分属于规范研究或者理论探讨。东方管理的研究或中国管理的研究属于开创性研究,虽然研究主题比较宽泛,但却绝不是“假大空”式的。此外,脱离了管理实践的所谓理论研究同样会被贴上“假大空”的标志。席西民等^[9]提出,管理理论的“丛林乱象”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领导理论丛林更是异常“茂盛”。他们以领导理论为例,就针对中国管理研究对西方理论修正产生所谓新理论的现象表达了担忧,认为若全盘接受西方几十种不同的“管理理论”和几百种“领导定义”,进一步地,在中国情境下,在西方研究变量框架中通过加入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的方式,从而创造出大量的“新奇理论”,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将会导致“学术主张漫天飞”和领导理论“碎片化”繁荣的乱象。

“无病呻吟”式中国管理研究的产生与国内过于重定量研究而轻定性研究有关。贾旭东等^[10]认为,具有理工科院校及经济学背景的管

理学者们受其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定量研究有着“天然”的偏好,将数学模型或严密的数学推理和演绎同研究的科学性划等号。这种方法论偏好下的中国管理研究对管理中的情境因素和人的要素的关注越来越缺少,有沦为一种“数学游戏的危险”,会导致“吃糖模式”管理研究的大大增加,即运用高深优美的数学模型证明了“糖是甜的”这种生活常识^[11]。这些研究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模型,研究论证了一种管理常识,其研究结论对于理论和实践都无丝毫贡献,但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方式却成了中国管理研究的通病。

中国学者对当前国内管理学研究的实证倾向颇有体会。例如,谭劲松曾在2005年举办的一次由20余家中国顶尖经济管理学术期刊编辑参与的恳谈会上,被有些编辑提出的“学术期刊只应发表实证研究”的倡议所震惊。韩巍等^[12]对此也深有感触:“在中国最好的那些管理科学杂志上还能看到几篇‘非实证’研究的文章,在中国最好的那些管理学院能有几个博士敢尝试‘非实证’研究的论文,又有几个‘非实证’研究得到了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每个问题都振聋发聩,引人深省。

综上所述,中国管理研究选题同时存在着“假大空”和“无病呻吟”的误区。难怪郭重庆^[13]发出中国管理研究“自娱自乐”、“吃别人嚼过的馍”、学术研究和管理的实践“两张皮”、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等感慨。中国管理研究已然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中国管理研究如何选题便成为重中之重,那么为避免“学术灌水”^[14],应该如何判断研究选题的科学性呢?换言之,中国管理研究选题是否落入“假大空”或者“无病呻吟”的陷阱,应如何判断?这是值得学者们深思的问题。

3 中国管理研究选题科学性的判断

《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曾于2006年对该刊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讨论,在所有83位董事会成员中,持“接受更具创新性的研究”的占17%,排在第一位。同样,对于中国管理研究而言,其创新性更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管理研究选题的首要判断标准是创新性。中国管理研究吸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面对的是中国管理实践的土壤,但却在西方管理理论的大树下成长,因此,关于理论和实践、东方和西方的争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也一直延绵不休。对于理

论和实践,《美国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于2011年刊发了一篇评价有贡献的理论文章,其评价标准分为新颖和实用两个维度,其中实用性包括在科研用途或在实践用途方面的实用性^[15]。对于东方和西方,近年来“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呼声越来越高。2011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持召开的“双清论坛”上,以文献^[16~18]为基础,徐淑英指出,发表于国际一级期刊的以中国管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数量逐年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即便在西方,中国管理研究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管理研究选题科学性的评价,需要首要考虑创新性,即探索(ex-plore)和开发(exploit)维度^[19]①;同时,引入研究中国管理研究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东方和西方(高情境化和低情境化)两个维度。由此,笔者将以理论和实践、东方和西方构建两个象限图,其一用来评价我国现有管理研究的分布,其二旨在为管理研究的科学选题避免“假大空”式或“无病呻吟”式的研究提供借鉴。

3.1 理论和实践

现阶段,我国的管理期刊和学者似乎出现了明显分化,姑且分别称之为学术型和实践型。举例而言,《清华管理评论》、《北大商业评论》和《南开管理评论》出现明显分化:前两者以实践为导向,以规范研究为主,主张立足企业实践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后者则演变为完全学术导向的期刊,发表的论文具有明显的理论导向。学者也因此分化为两类:一类以学术研究为主;另一类则以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表现为企业管理咨询、培训等,并且两类间存在着相互看不起等不和谐现象。企业同样也对学者产生误解,研究管理却不懂如何经营企业是最为常见的抱怨。期刊和学者的分化导致了管理理论和实践“两张皮”、“上不顶天,下不立地”的现状,而两者相结合的则较少。鉴于此,不禁使人发问,是否存在“顶天立地”的管理研究?

其实管理理论和实践并不能被割裂。在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论坛上,席西民曾探讨了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认为好理论应当是有实践的理论,好实践应当是有理论的实践,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但这并不能要求管理理论直接给管理实践提供答案,管理理论的重点在于给实践以思想启示、过程参考和促进管理水平提高。由此,管理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就像从一座山的两边分别攀爬,过程虽然存在明显分

离,但登上山顶后会相遇,所以目标是一致的^[20]。陈春花等^[21]指出,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应具有问题导向,即“问题优先于方法”,因此,管理研究评价指标应该包括实践维度。顾基发^[22]也认为,没有好的理论做指导,管理实践就会在低水平中重复,而磨刀不误砍柴工,因此,需要率先把实践经验提升成理论,再进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TSUI^[23]则强调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需要帮助企业改进绩效。

由此可以看出,管理理论需要指导管理实践在中国管理学界达成一定共识。西方经验也表明,诸如Z理论、组织学习理论、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和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理论等大都来自企业实践,以解决企业管理实践问题为出发点,研究结论也在当时获得了广泛关注和实际应用^[24]。由此,管理研究应该兼顾管理理论和实践,既不单独服务于实践,也不单独为理论贡献而存在^[21],那么,怎样在确保实践导向的同时使研究具有理论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呢?理论的“解释性框架”与实践所要求的“操作性规则”如何才能有机统一?怎样才能使管理研究的读者同时包括学者和管理者?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求中国管理研究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倡导问题导向,并使用规范的方法来展开研究。

若能达成这一共识,便可以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对管理研究进行评价。由图1可知,探索性和理论性的管理研究大多具有较为宽泛的研究范围,与之相对应,开发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研究则具有精细化的特点。由此,随着管理研究由理论性向实践性或者由探索性向开发性转变时,代表选题范围的“圆”有逐渐变小的趋势。我国目前的管理研究以开发性为主,即大多数处于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表现为用已有理论解释实践现象或问题,或者对已有理论进行所谓的完善和改进,而缺乏原创性的成果。这样的结果导致管理和实践的严重分离,使大量的管理研究陷入要么“假大空”或要么“无病呻吟”的误区,而探索性的解决新的实践问题或者构

① 探索性和开发性原本是描述知识创新的两个维度,是由BENNER等^[19]依据知识或技术路径的偏离(或接近)程度和现有客户/市场细分偏离程度这两个维度,所最先提出的开发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两种不同的创新方式。其中,探索性创新就是依靠新知识或者脱离既有知识来进行新的设计、开拓新的市场或开辟新的分销渠道,旨在满足正在形成的市场和顾客需求,类似于激进式创新;开发性创新则是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提升组织的既有技能、过程和结构,旨在满足既有市场和顾客需求,类似于渐进式创新。在管理研究领域,研究的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同样是两个重要的维度。

建新的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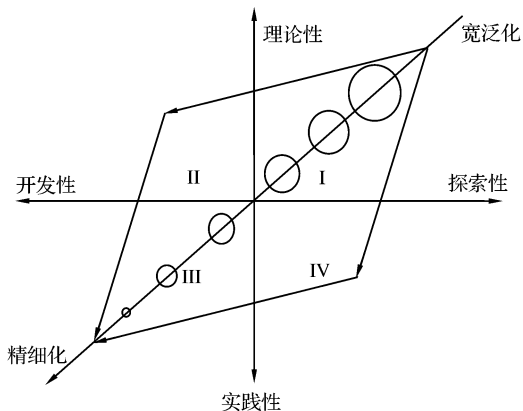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选题判断——理论和实践

以直面管理实践、发展新的管理理论为目标,科学的管理研究选题应该处在坐标中的哪个位置呢?笔者认为,好的中国管理研究选题首先位于第四象限(高实践性和高探索性),即从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已有理论无法解释)并进行探索性研究。这些研究往往关注于实践现象的解释和初始理论的构建,虽是宽泛的或者精细化的,但由于对于后续研究具有较大的启示性,因此,绝非是“假大空”式或“无病呻吟”式的。对现实中新问题的研究其后续的发展路径则可能有两种:其一是进行理论构建(第一象限)和完善(第二象限);其二是构建理论进一步指导企业实践(第三象限)。

“顶天立地”的研究多处于第一象限,立足于现实问题,并创新性地上升到理论高度。“假大空”式的研究多出现在第二象限,表现为脱离实践问题,对理论进行所谓的完善。“无病呻吟”式的研究则多位于第三象限,表现为囫圇吞枣地用大量已有理论的实践启示为企业实践提供建议,但对理论又无修正,或是利用实践数据对已有理论不厌其烦地进行验证。

3.2 东方和西方:高情境化和低情境化

衡量中国管理研究选题是否合理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如何处理中国管理研究的情境化问题,即是东方和还是西方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将直接涉及中国管理研究是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话语权。谢佩洪等^[25]认为,如果一味地追随美国的学术前沿和研究范式,中国学者很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那么,应该如何处理东方和西方这一情境化问题呢?郭重庆^[13]认为,应将“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作为中国管理学界下一阶段的目标,而要使中国管理科学得到发展,产生世界影响力,则必须实现从“照着讲”向结

合中国情境的“接着讲”转变。至于如何“接着讲”,谢佩洪等^[25]指出,应该“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和“对着西方管理学讲”,并且“对着西方管理学讲”应该处于第三位,即要先专注于本土研究,后与西方研究平等对话。

基于这一逻辑,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存在距离,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现象和解决中国问题,因此,构建本土理论非常必要。鉴于此,笔者构建了中国管理研究科学选题的第二个维度:东方和西方,即高情境化和低情境化(见图2);前者是指直面中国管理传统文化和管理实践;后者指国际化、全球视野^[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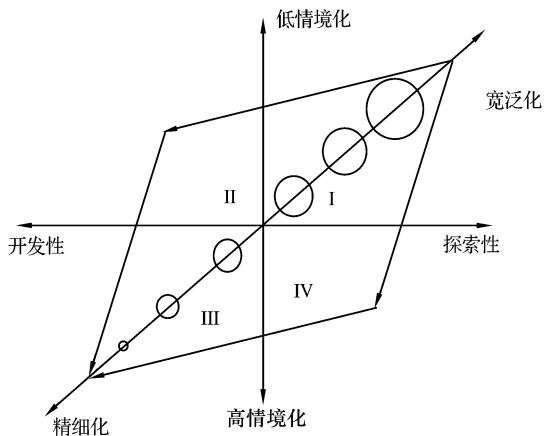


图2 研究选题判断——东方和西方

我国现有的管理研究多处于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即仍旧专注于西方理论对中国管理的启示或简单修正,仅停留于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然而,这条路线的研究对管理理论发展的贡献有限,因为它的目标不是去发现一些对本土管理现象的新解释^[27]。目前,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凤毛麟角。TSUI等^[17]回顾了发表于2000年1月~2003年6月之间的106篇中国组织研究相关的论文,发现仅有两篇文章提出了新理论。鉴于此,现阶段处于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的管理研究还远远不足。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是否可以达到“顶天立地”的效果(自然就避免“假大空”或“无病呻吟”的陷阱)呢?笔者同样以管理理论构建为例,旨在为中国管理研究选题提出相关建议。管理理论一定是产生于高情境化下,并在更广泛的情境下进行推广和应用的,因此,好的选题首先应位于第四象限。毋庸置疑,东方管理学^[28]、和谐管理理论^[29]、道本管理理论^[30]、和合管理理论^[31]、C理论^[32]、M管理理论^[33]等以中华传统

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管理理论相继出现,为管理学的本土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人们仍存在两个方面的担忧:①某些理论存在较为严重的文化认同倾向,但似乎缺乏组织经验的支持,缺乏对社会科学理论一般约定的遵循,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辞^[34],存在能否经得起管理实践检验的不确定性;②好的管理理论应该具有普适性,这些在中国情境下建立的理论,要看其是否能成为传统主流理论的合理延伸,如果是,则会被国际社会认可(从第四象限到第一象限),在更多情境内显示出适用性和指导性(由第一象限到第二象限),反之,因为其可以实际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问题,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由第四象限到第三象限)。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管理研究所面临的只是中国情境下的问题吗?如今,全球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管理研究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并不只是高情境化的,还要面对走进来的全球企业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所面临的管理实践问题是复杂和多国情境的。由此,笔者认为,中国管理研究所面临的“中国管理实践”是比“中国情境化下的管理实践”更为宽广的概念。鉴于此,“顶天立地”的中国管理研究多位于第一象限,即中国管理研究应着眼于国际企业中国本土发展和中国企业全球扩张的管理实践,关注于更广泛的情境。“假大空”式的研究可能出现在第二象限,表现为已有理论在更多情境下的开发性完善,体现为各种衍生性理论的产生,可能失去具体情境下的实践指导作用,也失去了创新性;“无病呻吟”式的研究则最有可能出现在第三象限,表现为在具体情境中对理论的反复验证等。

4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科学的管理研究一定不是主观臆想的、过于宽泛化或过于精细化的。一个好的中国管理研究选题应该能够创新性地解决中国管理的实践问题,或者具有普适性的理论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可以用规范的定性或者定量的研究方法进行解释和解决,从而增加中国管理研究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而不是仅为获得国家的课题基金立项或者发表论文而凭空构思出一个所谓的“问题”甚至“伪问题”,或者陷入对西方理论进行“检验—修正—再检验—再修正”的无谓循环。当然,强调探索性的、直面管理实践的管理研究,并不意味着其他管理研究都是不科学的,是“假大空”或者“无病

呻吟”的。鉴于我国管理研究起步较晚,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引入和修正同样有其重要性,但是对其过多依赖容易使中国学者的管理研究误入歧途。由此,通过直面管理实践进行探索性研究并构建新理论,虽然困难重重,但更为重要。

鉴于此,针对当前我国管理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深化学术机构和大学的去行政化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唯一或主要根据学术标准,而非其他与学术无关的指标,甚至某些领导的好恶来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并做出有关学术职称晋升与否的决定;同时,充分发挥“教授会”以及类似学术组织和国际同行专家的作用,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采用同行匿名评审的方式,从制度上保证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学术水平上。

(2)上级部门或机构对学术机构或大学,尤其是著名学术机构和大学的领导的考核不应采取类似于单纯追逐GDP指标一样的考核方式(如是否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等),而应重点关注是否解决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研究项目或国际学术前沿的尖端课题,鼓励有才华的学者潜心研究自己感兴趣和有深度的研究主题,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对做出突出成绩的予以破格提拔并给予奖励。

(3)学术刊物和出版机构,尤其是重要学术刊物和出版机构应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净化国内学术环境中的重要责任和作用。鉴于目前国际国内学术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在重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如果学术刊物不能完全依据稿件的学术水平来决定论文的发表与否,那就会污染了学术源头,长此以往,不仅会恶化现有的学术生态,也会危及刊物自身的生存。

(4)每个学者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学术机构或大学从事创造性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要坚守学术道德和规范,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弄虚作假。净化学术生态和环境既是大家共同的期盼,更是大家共同的责任。肯尼迪曾说过:“信仰在风中飘扬。”每个学者都要思考,面对浑浊,能否不同流合污,让自己的勇气在腐烂的中庸泥潭中发光。

总之,殷切希望中国的管理研究可以少一些“假大空”和“无病呻吟”,多一些“顶天立地”的研究,即顶着理论“普适性”的天、立着中国“实践情境”的地;顶着国际化的天,立着中国国情的地。令人欣喜的是,当下基于中国企业实

践案例的探索性研究逐渐增多,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管理理论已经到了即将破冰的阶段。

参 考 文 献

- [1] 郭重庆. 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J]. 管理学报, 2011, 8(12): 1 733~1 736
- [2] 陈劲, 王鹏飞. 以实践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评价[J]. 管理学报, 2010, 7(11): 1 671~1 674
- [3] 李平. 试论中国管理研究的话语权问题[J]. 管理学报, 2010, 7(3): 321~330
- [4] 邓中华, 闫敏. 中国管理研究的关键时刻: 专访徐淑英教授[BD/OL]. (2011-12-02)[2014-04-01]. <http://finance.ifeng.com/leadership/llxz/20111202/5187231.shtml>, 2011
- [5] 王春永. 博弈论的诡计: 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策略 II [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 [6] 张玉利, 李静薇. 基于实践的学术问题提炼与中国管理模式总结[J]. 管理学报, 2012, 9(2): 179~183
- [7] 尤树洋, 贾良定, 蔡亚华. 中国管理与组织研究 30 年: 论文作者、风格与主题的分布及其演变[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3): 86~93
- [8] 苏勇, 于保平. 东方管理研究: 理论回顾与发展方向[J]. 管理学报, 2009, 6(12): 1 578~1 587
- [9] 席西民, 韩巍. 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 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30(2): 32~39
- [10] 贾旭东, 谭新辉. 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J]. 管理学报, 2010, 7(5): 656~665
- [11] 李海舰. 学术论文的规范与创新[J]. 经济学家茶座, 2006(2): 45~56
- [12] 韩巍, 席西民. “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一个行动导向的解读[J]. 管理学家: 学术版, 2010(6): 3~19
- [13] 郭重庆. 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J]. 管理学报, 2008, 5(3): 320~322
- [14] 谭劲松. 关于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讨论[J]. 管理世界, 2007 (1): 81~92
- [15] CORLEY K G, GIOIA D A. Building Theory about Theory Building: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1): 12~32
- [16] LI J T, TSUI A S. A Citation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1984~1999[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1): 87~107
- [17] TSUI A S, SCHOONHOVEN C B, MEYER M W, et 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Midst of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 (2): 133~144
- [18] DU J Y.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A Three-Decade Review[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2, 8(1): 173~209
- [19] BENNER M J, TUSHMAN M L. Exploitation, Exploration, and Process Management: 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evisited[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2): 238~256
- [20] 孙继伟, 於军. 交叉路口的彷徨、兴奋与学术争鸣——第 3 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J]. 管理学报, 2010, 7(9): 1 263~1 271
- [21] 陈春花, 刘祯.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评价的维度——实践导向与创新导向[J]. 管理学报, 2011, 8(5): 636~647
- [22] 顾基发. 关于中国管理实践的评价[J]. 管理学报, 2011, 8(5): 633~635
- [23] TSUI A S. 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5(1): 1~14
- [24] 田志龙, 王浩.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路径[J]. 管理学报, 2011, 8(2): 159~178
- [25] 谢佩洪, 魏农建. 中国管理学派本土研究的路径探索[J]. 管理学报, 2012, 9(9): 1 255~1 262
- [26] 包国宪, 王学军, 贾旭东.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管理本土研究新进展——中国管理国际学术论坛观点综述[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7): 152~157
- [27] 李平. 试论中国管理研究的话语权问题[J]. 管理学报, 2010, 7(3): 321~330
- [28] 苏东水. 弘扬东方管理文化建立中国管理体系[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2(3): 33~36
- [29] 席西民, 尚玉钊. 和谐管理思想与当代和谐管理理论[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21(3): 23~26
- [30] 齐善鸿, 曹振杰. 道本管理论: 中西方管理哲学融合的视角[J]. 管理学报, 2009, 6(10): 1 279~1 284
- [31] 黄如金. 和合管理: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J]. 管理学报, 2007, 4(3): 135~140
- [32] 成中英. C 理论: 中国管理哲学[M]. 上海: 雪林出版社, 1999
- [33] 曾仕强. 中国式管理[M]. 北京: 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 2005
- [34] 韩巍. 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看管理学在中国[J]. 管理学报, 2008, 5(2): 161~168

(编辑 郭恺)

通讯作者: 金占明(1955~), 男, 内蒙古通辽人。清华大学(北京市 100084)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战略群组等。E-mail: jinzhm@sem.tsinghua.edu.cn